

社会流动与人际信任： 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

高学德

(兰州大学 教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探讨社会流动影响人际信任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流动通过“经济”效应和“道德”效应这两种机制间接影响人际信任,但这两种效应对人际信任起作用的方式是不同的。“经济”效应对包括熟人信任和生人信任在内的人际信任表现出了同样的效应,它强化了向上社会流动对人际信任的提升作用。但“道德”效应对熟人信任和生人信任这两类信任的间接作用却表现出与“经济”效应明显的不同,它对熟人信任无显著性影响,而对生人信任却有非常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研究还发现,不同社会流动类型对人际信任表现出了差异性的影响效应。从社会流动角度考察人际信任形成的内在机制,不仅能够为人际信任研究提供新视角,也能为寻求转型期人际信任的提升和重建提供启示。

关键词:社会流动;人际信任;“经济”效应;“道德”效应;熟人信任;生人信任

中图分类号:C912.6/B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5)06-0029-09

一、问题的提出

信任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主题之一,作为信任之基石的人际信任也受到了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管理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学者的极大关注。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就人际信任的概念与结构、形成机制以及作用和功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并就我国社会人际信任的现状和特点、产生原因以及提升对策等重要问题开展了广泛的研究。

在有关人际信任的诸多研究中,一个长期以来被学术界激烈讨论的重点问题是:哪些因素影响了人际信任的形成?其内在的生成机制又是什么?围绕着以上问题,不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尝试采用不同的视角来加以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人际信任的解释模型,如心理学科中的人格模型^[1]、社会学学科中的社会资本模型^[2]和社会化模型^[3],经济学中的收入不平等模型^[4],政治学中的政府绩效模型^[5-7]以及文化领域中的相关解释^[8]等。这些理论模型有助于我们以更广阔的视角

* 本论文使用数据来自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之《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执行,项目主持人为李路路教授,边燕杰教授。作者感谢上述机构及其人员提供数据协助,本论文内容由作者自行负责。

收稿日期:2015-04-17

作者简介:高学德,法学博士,兰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社会流动视角下的人际信任影响因素研究”(15LZUJBWZY008),项目负责人:高学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现代社会信任模式与机制研究”(11&ZD149),首席专家:周怡;教育部人文社科西部和边疆青年基金项目“信任的心理机制研究”(12XJC190001),项目负责人:韩振华。

和眼光理解人际信任及其形成。但这些理论解释大多是在西方社会背景中提出的,并且无论是从较为宏观的制度、社会和文化层面还是从较为微观的人格、道德等个人心理层面来研究人际信任的产生机制,大多是从静态的视角来研究人际信任,即强调处于特定社会位置的个人或群体为什么或在多大程度上信任/不信任他人。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是完全封闭或开放的,也就是说,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个人生命历程中,由于一些社会的或个人的原因会发生许多的位置变迁,而伴随着社会位置的流动和变迁,人们的社会态度和行为也会相应地变化,特别是对于身处急剧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人而言更是如此。因而,对中国人信任的研究应“注意到中国社会的变迁”^[9],而从作为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之重要特点和结果的社会流动视角出发来研究人际信任即是遵循以上研究传统而进行的尝试。

本研究把既作为社会流动结果又作为人际信任形成原因的个人经济地位和道德认同这两个个体心理变量作为社会流动影响人际信任的中间变量加以研究,通过深入考察社会流动影响人际信任的间接效应,并比较这些内在机制表现出的针对不同人际信任类型(熟人信任和生人信任)差异性的特点,不仅可以为人际信任研究提供新视角,而且也寻求转型期人际信任的提升和重建提供启示。

二、社会流动与人际信任

社会流动是指人们在社会关系空间中从一个社会地位到另外一个社会地位的移动,也就是社会成员在不同社会位置之间的变动。大量的研究发现,流动者社会位置(主观或客观)的改变——无论是发生在代际之间(代际流动)还是代内之间(代内流动),无论是地位上升(向上流动)还是下降(向下流动)——本身都能够给其带来主观行为模式与认知评价方面的差异,如会影响人们的社会政治态度、健康以及人际关系状况等。同样,社会流动对与人际交往和社会互动之基础的人际信任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在社会流动与人际信任关系的研究中,学术界大致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即社会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际信任水平。但这些研究大都停留在社会流动与人际信任关系的理论阐释上,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得到的研究结论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甚至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研究仅将社会流动作为解释人际信任形成的直接变量,忽视了社会流动影响人际信任内在机制的考察,特别是忽视了对已有大量文献中关于人际信任形成的社会、文化等宏观变量和人格、道德等微观个人变量的考察,而这些变量特别是被经常用以解释人际信任的一些个人层面的变量,由于更容易受到客观社会现实的形塑和重构,而既可能是影响人际信任的直接变量,也可能是受社会流动影响而成为人际信任的间接影响变量。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试图考察社会流动影响人际信任的中间机制。在已有研究中,学者们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考察社会流动影响人际信任的内在机制。

首先,根据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人际信任本质上是一种风险性行为,是理性人之间不断理性博弈的产物,是理性行动者之间彼此做出的理性行为。^[10]个体经济资源的优势使得个体在与其他人交往中有较小的相对易损性^[11],高社会经济地位者有较多的经济资源,因而在面临失信风险时,要比低社会经济地位者更容易保护自己,而低社会经济地位者则面临更大的信任风险,特别是与生人交往时更是如此,一次轻微的受骗往往使他们倾家荡产。对他们而言,背叛信任引出的后果更为严重,因而他们对他人的信任度要低于高社会经济地位者。正如班菲尔德所指出的:如果某人有一个安全经济边际,那么他对别人的信任就更安全。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由错误信任所招致的损失可能是致命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人际信任的正向预测作用得到了很多跨文化研究的证实。^[3,12-13]而社会流动有助于改善个体的经济状况,提高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14-16],特别是对于向上社会流动者而言更是如此。因此,社会流动可能通过经济效应或经济化机制对人际信任产生间接影响。

其次,社会流动还可以通过改变流动者的道德水平从而对人际信任的形成产生道德效应。社

会流动使得个体走出传统意义上的“礼俗社会”而进入到“法理社会”，主要的活动场域由传统乡土社会的私人领域进入到现代工业社会的公共领域，与他人特别是陌生人的互动强化了他们对公共秩序的遵守和现代社会价值规范的认可，因此，社会流动特别是向上社会流动有助于提高个体的道德教化意识和对社会规范的认可，而对道德行为和社会规范的共识使得个体在互动中对他人的行为有更高的预测度。人际信任形成的道德模型假定，人类拥有的对他人的同情和对公平的渴望的道德意识会促进信任的形成，从而提高对他人的信任度。^[17]因此，社会流动也可能通过道德效应或道德化机制对人际信任产生间接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社会流动通过经济效应和道德效应影响人际信任的具体假设。

假设 1:社会流动有助于改变个体的经济地位。向上社会流动能够提高个体的经济地位，向下社会流动能够降低个体的经济地位。

假设 2:社会流动有助于改变个体的道德认同水平。向上社会流动有助于增强个体的道德认同水平，向下社会流动能够降低个体的道德认同水平。

假设 3:社会流动通过改变个体的经济地位和道德认同水平间接影响人际信任。

三、数据、变量和分析策略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数据来源为“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 年数据,采用的是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各阶段的抽样单位分别为:以中国的区(县)为初级抽样单位,以街道(乡镇)为二级抽样单位,以居民(村民)委员会为三级抽样单位,随机抽取家庭住户,再在每户随机抽取 1 人。CGSS2005 年样本覆盖中国大陆 28 个省级单位(宁夏、青海和西藏除外)中的 125 个区县,包含了 590 个居民委员会和 410 个村民委员会中的 10 372 个 18 周岁以上的中国成年公民。其中,6 098 个样本(大约占总样本的 58.8%)为城镇居民,另外 4 274 个样本(大约占 41.2%)为农村居民。本研究根据被访者近三个月的工作状况进行筛选,剔除了“从未工作过/在学且没有工作”的样本,最后得到有效样本 10 151 个。样本的具体情况详见表 1。

表 1 基本变量的描述统计

| 变量 | 编码 | 频数 | 百分比 |
|------|----------------------|-------|------|
| 性别 | 女 | 4 938 | 50.9 |
| | 男 | 4 756 | 49.1 |
| 地域 | 农村 | 4 182 | 43.1 |
| | 城市 | 5 512 | 56.9 |
| 年龄 | 平均数:45.15,标准差:14.36 | | |
| 收入 | 平均数:9 159,标准差:13 162 | | |
| 政治面貌 | 非共产党员 | 8 596 | 88.7 |
| | 共产党员 | 1 098 | 11.3 |
| 婚姻状况 | 未婚 | 717 | 7.4 |
| | 已婚 | 8 344 | 86.1 |
| | 离婚或丧偶 | 631 | 6.5 |
| 教育水平 | 小学及以下 | 3 586 | 37.0 |
| | 初中 | 2 936 | 30.3 |
| | 高中及中专 | 2 185 | 22.5 |
| | 大专及以上学历 | 986 | 10.2 |
| 户籍 | 农村 | 4 417 | 45.7 |
| | 城镇 | 5 253 | 54.3 |

(二)变量

1. 结果变量

本研究最主要的结果变量是人际信任。本研究将它界定为个体的一种心理期待、态度或行为倾向,而非实际行动本身。人际信任的对象是作为特定交往对象的人或个体,而作为个体的交往对象又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类型化的区分(如基于血缘、地缘、兴趣爱好、价值观、情感、义务、熟悉性等),因而,人际信任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型。我们将根据调查数据中不同交往对象信任度得分的因子分析结果来对人际信任进行类型划分,最后抽取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熟人信任”和“生人信任”。两个因子各解释总方差的 33.05%和 29.3%,合计 62.35%。这一结果也与杨中芳等人^[9]的划分完全一致。

2. 解释变量

(1)社会流动。社会学关于“社会流动”的概念不仅强调人口在地域空间的移动,也重视个人或群体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社会地位的变化和相应角色的转换,特别是在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还包括户籍位置的变化。因此,对社会流动概念的完整把握应该从内容和方向两方面来把握:从内容来讲,要考虑不同方面的社会位置的变化,如职业流动、教育流动和户籍流动;从方向上来讲,既包括向上流动,也包括向下流动和平行流动(或未流动)。基于此,本研究对社会流动的类型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每一种流动类型又包括向下流动和向上流动。

职业流动。以职业作为社会流动的基本标准是社会流动研究最常用的做法。处于同一职业的人们由于同样的职业责任、义务和共同工作的社会互动产生合作和共享的价值观,因而可以作为衡量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良好指标。^[18]依据大多数关于职业流动(代际)的界定,本研究所指职业流动(代际)是指上一代(父亲)与下一代(子女)之间的职业地位或阶级阶层位置的变化情况。因此,对职业流动的操作化首先需要确定职业或职业地位的分类标准,然后根据此标准对被访者现职和被访者父亲的职业进行归类,并进行不同职业流动类型的分析。我们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和戈德索普的阶级分类框架^[19-21],并参照中国学者使用 EGP 分类框架的经验^[22],对 CGSS2005 年中的职业类型归为以下五种:社会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个体经营者、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和农业劳动者。确定了职业的归类标准后,我们分别将被访者的现职和被访者父亲职业进行相应的归类。现职是人们当前或失业前/退休前的职业,是代际流动的终点;被访者父亲职业通常作为家庭背景变量的重要测量指标^[23],是代际职业流动的起点。

职业流动按方向可以分为向下流动、向上流动和未流动,而对这三类不同方向流动类型的划分可以通过建立流动表的方式来测量^[24]。首先,根据被访者现职和被访者父亲的职业形成二维列联表(即流动表),职业阶层地位由低到高排列,这样就形成了 5×5 双向列联表。列联表对角线位置的单元表示未发生职业流动(或称水平流动),非对角线位置的单元表示发生职业流动(或垂直流动),其中,对角线上方表示向上流动,对角线下方表示向下流动。最后,将所有职业流动编码为三类:未流动或水平流动编码为 0(做回归分析时作为参照组),向下流动编码为 1,向上流动编码为 2。

教育流动。大量研究表明,人们的教育水平是预测人们社会政治态度的重要指标^[25]。有关教育水平与人际信任的研究也发现,人际信任特别是社会信任水平与受教育程度成正比^[26],高等教育还被普特南视作影响个体信任形成的最重要因素。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不仅有助于个体获得较丰厚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对个体的发展具有经济效应^[27],特别是对中国人而言,中国高等教育以其经济效应机制作为影响社会信任形成的主要途径^[28]。因此,我们可以预测,教育流动特别是教育向上流动同职业流动一样对人际信任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本研究中,教育流动主要是代际流动,同职业流动一样,按流动方向也划分为教育向上流动和教育向下流动,对其的测量同职业流动,是根据被访者当前教育水平和被访者父亲教育水平建立流动表的方式来实现的。教育流动的具体操作化方法也同职业流动。

户籍流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加剧,越来越多的非本地户籍人口,特别是外来的农村劳动力来到城市生活、工作乃至定居下来。由于户籍制度与人们在劳动用工、住房、医疗、教育、就业、人事关系、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与公民权益相挂钩的各个领域有密切的关联,因而造成严重的社会排斥,并可能给信任带来了重要的负面影响。^[29] 户籍流动的具体操作化方法是根据被访者父亲的户籍和被访者户籍形成二维户籍流动表获得,那些户籍未流动者(主要是指一直是农业户口的人)被作为参照群体,编码为0;城镇户口转为农业户口者为户籍向下流动(这种情况在样本中分布非常少,但为了研究的完整性,在进行统计处理时仍然将其纳入到回归方程中,但不做具体分析),编码为1;被访者从农业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为户籍向上流动,编码为2。

(2)个体经济地位。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对一个人经济地位或经济水平的衡量一般有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两种方式。客观指标常常用个人的月收入或年收入来衡量,而主观指标一般使用个人对自身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认同来衡量。我们认为,对经济地位或经济水平的有效测量不能仅仅停留在依据客观指标进行测量的层面,特别是当用这一指标来预测人们的社会态度时,更应该观照个体的主观建构层面,无论是一个社会的客观分层结构还是一个人的经济地位,无疑会反映在人们的主体意识中。基于以上分析,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被访者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同作为经济地位的操作化指标,CGSS2005年调查数据对被访者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测量是通过“与同龄人相比,您认为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这一测题来进行的。

(3)个体道德认同。道德认同即人们对当代社会的基本社会规范和道德行为的认可程度。人们越是有较高的道德教化意识和对良好道德行为的认可(或对不良道德行为的不认可),越容易使得个体在互动中对他人的行为有更高的预测度,从而可能提高对他人的信任度;反之亦然。CGSS2005年调查数据对被访者道德认同的测量是通过“如果别人有以下行为,您的反应/看法是怎样的呢?”这一题目来进行的,具体包括“在公众/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吸烟者在非吸烟者面前或附近吸烟”等13个具体指标。每一个具体指标有五个选项:“不反感”、“不太反感”、“无所谓”、“比较反感”、“很反感”,分别赋值为1、2、3、4、5。计算被访者所有13个指标得分的加总平均,即得到“道德认同”变量的分数,得分越高,表明受访者的道德认同水平越高,反之就越低。

(三)分析策略

本研究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线性回归模型来估计社会流动对人际信任的间接影响效应。需要说明的是,在具体分析过程中,由于道德认同为定距变量,因此以它为结果变量来考察社会流动对其影响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来建立回归模型;但经济地位为定序变量,以它为结果变量来考察社会流动对其影响时,按照回归分析对变量的基本要求,应该使用定序逻辑斯蒂模型(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但为了在图标结果表达上和道德认同的回归结果一致,也为了解释上的方便,本研究同样将经济地位作为定距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同时我们也使用定序逻辑斯蒂模型分析了社会流动对经济地位的影响,得到的结果与使用线性回归模型得到的分析结果完全相同。因此,将经济地位作为定距变量进行线性回归既能保持语言表达上的一致性和解释上的方便,又不会影响到对回归结果的解释。

四、研究结果

在具体的分析策略上,我们首先考察社会流动对经济地位和道德认同这两类中间变量(机制)的影响,只有确保这些中间变量显著地受社会流动的影响,才有可能进行间接效应的检验。

(一)社会流动对个体经济地位和道德认同的影响

表2显示的是三类社会流动类型对个体经济地位和道德认同的影响效果^①。

^① 由于篇幅所限,所有回归模型未显示性别、年龄、政治面貌等社会人口学变量的影响效应。

表 2 社会流动对个体经济地位和道德认同的影响

| | 模型 1:经济地位 | | | 模型 2:道德认同 | | |
|----------------|-----------|-----------|-----------|-----------|-----------|-----------|
| | 模型 1a | 模型 1b | 模型 1c | 模型 2a | 模型 2b | 模型 2c |
| 职业流动 | | | | | | |
| 向下流动 | 0.023 | | | 0.107 | | |
| 向上流动 | 0.078*** | | | 0.193* | | |
| 教育流动 | | | | | | |
| 向下流动 | | -0.062 | | | -0.062 | |
| 向上流动 | | 0.203* | | | 0.203* | |
| 户籍流动 | | | | | | |
| 向下流动 | | | 0.200*** | | | 0.882*** |
| 向上流动 | | | -0.107*** | | | 0.511*** |
| 常量 | -0.289*** | 5.800*** | -0.370*** | 5.898*** | 5.800*** | 6.185*** |
| F | 53.856*** | 51.162*** | 50.020*** | 67.467*** | 64.241*** | 71.532*** |
| R ² | 0.091 | 0.090 | 0.094 | 0.109 | 0.109 | 0.115 |
| N | 8 660 | 8 260 | 8 638 | 8 851 | 8 442 | 8 829 |

由表 2 的结果可以看出,在不考虑性别、年龄、政治面貌等社会人口学变量的情况下,无论是职业流动还是教育流动,向上流动不仅提高了个体的经济地位,也提升了个体的道德水平,因而向上流动对个体既具有提升经济地位的功能,也具有强化道德认同的功能。这一结果基本验证了假设 1 和假设 2。而就户籍流动对经济地位和道德认同的影响而言,在不考虑性别、年龄、收入等社会人口学变量的情况下,与未流动者相比,户籍向上流动降低了流动者的经济地位,却提升了流动者的道德水平。这也表明,户籍流动特别是户籍向上流动对个体兼具经济效应和道德效应的功能,但与职业流动和教育流动相比却出现了不同方向的变化。

接下来我们将分别考察职业流动、教育流动和户籍流动是否通过经济地位和道德认同这两种间接机制来影响人际信任水平。具体分析结果见表 3、表 4 和表 5。

表 3 职业流动对人际信任的影响:经济地位和道德认同的间接效应

| | 模型 3:熟人信任 | | 模型 4:生人信任 | |
|----------------|-----------|-----------|-----------|-----------|
| | 模型 3a | 模型 3b | 模型 4a | 模型 4b |
| 职业流动 | | | | |
| 向下流动 | 0.022 | 0.026 | -0.020 | -0.018 |
| 向上流动 | 0.059* | 0.064** | 0.111*** | 0.108*** |
| 经济地位 | 0.057*** | | 0.093*** | |
| 道德认同 | | 0.003 | | -0.036*** |
| 常量 | 4.131*** | 4.103*** | 2.764*** | 2.952*** |
| R ² | 0.045 | 0.041 | 0.022 | 0.029 |
| F | 23.359*** | 21.743*** | 10.108*** | 14.147*** |
| N | 8 528 | 8 712 | 7 832 | 7 994 |

表 3 显示的是职业流动通过经济地位和道德认同间接影响人际信任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 3 是针对熟人信任进行的 OLS 分析模型,模型 4 是针对生人信任进行的 OLS 分析模型。模型 3a 和模型 4a 考察的是经济地位的间接效应机制,模型 3b 和模型 4b 考察的是道德认同的间接效应机制。由表 3 的结果可以看出,整体而言,职业流动通过经济地位效应和道德认同效应两种内在机制对人际信任产生显著影响。但对于熟人信任和生人信任,职业流动起作用的机制是不同的:无论对于熟人信任还是生人信任,经济效应都起到了非常显著的积极作用,也就是说,向上流动增加了流动者的经济地位,经济地位的增加提升了个体对他人(包括熟人和陌生人)的信任;但道德认同机制对两类信任的间接作用却表现出明显的不同:道德认同对熟人信任无显著性影响,而对生人信任却有非常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也就是说,虽然向上流动提高了个体对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的认同,

但这种道德认同并未提升对熟人的信任,不仅如此,它还降低了对陌生人的信任。也就是说,一个人对他人的道德行为的评价越低(越反感别人的不道德行为),那他对陌生人的信任也就越低。

综合表 2 和表 3 的结果可以得出结论:职业流动通过“经济效应/道德效应”机制间接影响人际信任。假设 3 在职业流动中基本得到了验证。

表 4 教育流动对人际信任的影响:经济地位和道德认同的间接效应

| | 模型 5:熟人信任 | | 模型 6:生人信任 | |
|----------------|-----------|----------|-----------|-----------|
| | 模型 5a | 模型 5b | 模型 6a | 模型 6b |
| 教育流动 | | | | |
| 向下流动 | 0.013 | 0.019 | -0.048 | -0.028 |
| 向上流动 | 0.030* | 0.028* | 0.023 | 0.023 |
| 经济地位 | 0.059*** | | 0.100*** | |
| 道德认同 | | 0.004 | | -0.036*** |
| 常量 | 4.182*** | 4.148*** | 2.800*** | 2.987 |
| R ² | 0.044 | 0.04 | 0.02 | 0.027 |
| F | 21.925*** | 20.26*** | 8.842*** | 12.556*** |
| N | 8 136 | 8 312 | 7 512 | 7 666 |

表 4 显示的是教育流动通过经济地位和道德认同机制间接影响人际信任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 5 是针对熟人信任进行的 OLS 分析模型,模型 6 是针对生人信任进行的 OLS 分析模型。模型 5a 和模型 6a 考察的是经济地位的间接效应机制,模型 5b 和模型 6b 考察的是道德认同的间接效应机制。结果表明,教育流动通过经济地位效应和道德认同效应两种内在机制对人际信任产生影响,但对于熟人信任和生人信任,教育流动起作用的途径是不同的:无论对于熟人信任还是生人信任,经济地位都起到了非常显著的积极作用,也就是说,教育流动提高了个体的经济地位,经济地位增强了个体对他人(包括熟人和陌生人)的信任。但道德认同对两类信任的间接作用却表现出极大的不同:对熟人信任无显著性影响,而对生人信任却有非常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也就是说,虽然教育向上流动提高了个体对道德行为和道德价值规范的认同,但这种道德认同并未提升对熟人的信任,不仅如此,它还降低了对陌生人的信任。

综合表 2 和表 4 的结果可以得出结论:教育流动通过“经济”效应和“道德”效应间接影响人际信任。假设 3 在教育流动情境下基本得到了验证。

表 5 户籍流动对人际信任的影响:经济地位和道德认同的间接效应

| | 模型 7:熟人信任 | | 模型 8:生人信任 | |
|----------------|-----------|-----------|-----------|-----------|
| | 模型 7a | 模型 7b | 模型 8a | 模型 8b |
| 户籍流动 | | | | |
| 向下流动 | -0.058 | -0.050 | -0.167* | -0.118 |
| 向上流动 | -0.105*** | -0.118*** | -0.045* | -0.038 |
| 经济地位 | 0.054*** | | 0.095*** | |
| 道德认同 | | 0.005 | | -0.036*** |
| 常量 | 4.072*** | 4.028*** | 2.772*** | 2.959*** |
| R ² | 0.047 | 0.043 | 0.019 | .027 |
| F | 24.379*** | 23.172*** | 9.004*** | 12.904*** |
| N | 8 506 | 8 690 | 7 810 | 7 972 |

表 5 显示的是户籍流动通过经济地位和道德认同两种机制间接影响人际信任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 7 是针对熟人信任进行的 OLS 分析模型,模型 8 是针对生人信任进行的 OLS 分析模型。模型 7a 和模型 8a 考察的是经济地位的间接效应机制,模型 7b 和模型 8b 考察的是道德认同的间接效应机制。结果表明,户籍流动通过经济地位效应和道德认同效应两种内在机制对人际信任产生影响,但对于熟人信任和生人信任,户籍流动起作用的途径是不同的:一方面,从经济地位的作用机制来看,无论对于熟人信任还是生人信任,经济地位都起到了非常显著的消极作用,也就是说,户

籍向上流动降低了个体的经济地位,这种经济地位的降低减弱了个体对他人(包括熟人和陌生人)的信任。另一方面,从道德认同的作用机制来看,道德认同对两类信任的间接作用却表现出极大的不同:对熟人信任无显著性影响,而对生人信任却有非常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也就是说,虽然户籍向上流动提高了个体对道德行为和道德价值规范的认同,但这种提升后的道德认同并未提升对熟人的信任,不仅如此,它还降低了对陌生人的信任。

综合表 2 和表 5 的结果可以得出结论:户籍流动通过“经济”效应和“道德”效应机制间接影响人际信任。假设 3 在户籍流动情境下基本得到了验证。

五、结论和讨论

本文利用 CGSS2005 年数据考察社会流动影响人际信任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社会流动通过“经济”效应和“道德”效应两种机制对人际信任有显著的间接影响作用,但这两种内在机制起作用的方式是不同的。首先,个体的“经济地位”对熟人信任和生人信任的间接影响作用表现出了同样的效应。无论对于熟人信任还是生人信任,“经济”效应机制都起到了非常显著的积极作用,也就是说,向上流动提高了流动者的经济地位,经济地位的提高提升了个体对他人(包括熟人和陌生人)的信任。这一机制在职业流动和教育流动对人际信任的影响表现出同样的效应。而在户籍流动中,“经济”效应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无论对于熟人信任还是生人信任,“经济”效应都起到了非常显著的消极作用,也就是说,户籍向上流动降低了个体的经济地位,这种经济地位的降低减弱了个体对他人(包括熟人和陌生人)的信任。其次,“道德”效应机制对两类信任的间接作用却表现出明显的不同:道德认同对熟人信任无显著性影响,而对生人信任却有非常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也就是说,虽然向上流动提高了个体对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的认同,但这种道德认同并未提升对熟人的信任,不仅如此,它还降低了对陌生人的信任。也就是说,一个人对他人的道德行为的评价越低(越反感别人的不道德行为),那他对陌生人的信任就越低。这一机制在所有三种社会流动对人际信任的影响中均表现出了同样的效应。

从不同社会流动类型对人际信任的影响效应来看,职业流动和教育流动的影响效应较为一致,而户籍流动的影响效应却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情况。那么,如何解释不同社会流动类型对人际信任的差异性影响?我们认为,不同社会流动对人际信任的差异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归结为社会开放程度的不同。在一个开放的社会结构中,向上社会流动能够有助于人际间信任关系的建立和维持,从而提升人际信任水平,而在一个封闭的社会结构中,向上社会流动则阻碍人际间信任关系的建立和维持,从而降低人际信任水平。

就当代中国社会的职业流动和教育流动而言,虽然各职业阶层和各教育阶层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阶层壁垒,但造成这些阶层之间壁垒和差异的结构性因素在减少,限制各阶层流动的制度化因素也在逐步减少。工业化的劳动分工模式促成了社会的等级分化,这种等级分化结构有利于刺激人们的上升流动欲望,越来越多的个人可以享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同时,大众化的教育体系确立并迅速膨胀,越来越多的来自下层阶层的个人可以通过接受教育来实现上升流动。^[30]在这样一个相对公平而又有更多机会的较为开放性的社会结构中发生的职业和教育向上流动有助于增强人们对他人的信任水平。从更深层的角度来看,这不仅仅是对他人或个人的信任,更反映了人们对整个社会和制度的信任。这可能是产生职业流动和教育流动正向影响人际信任的主要原因。

从户籍流动的效应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实施的户籍制度不仅导致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刚性分割,也造成了城市内部本地户籍人口与非本地户籍人口之间的分割。户籍制度成为限制人们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以及城市和城市之间自由流动的最重要的政策和制度安排。虽然户籍制度的松口和放开是大势所趋,但至少在目前,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突破户籍制度非常困难而且路径很少。同时,由于户籍制度与人们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有密切的关联,这种背景下农村户籍居

民的向上流动可能会占用城市居民更多的公共资源和生活空间,因而更易造成严重的社会排斥,并由此给人际信任带来了重要的负面影响。因此,相对于职业流动和教育流动而言,户籍流动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中进行的,这种结构下的向上流动可能导致人际信任水平的反向发展。

参考文献:

- [1] Deutsch, M. Trust and suspicion[J].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58(2): 265-279.
- [2] Putnam, Robert D., Robert Leonardi, and Raffaella Y. Nanetti.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3] Alesina, Alberto, and Eliana La Ferrara. Who trusts others?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2(2): 207-234.
- [4] Bjørnskov, Christian. The multiple facets of social capital[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6(1): 22-40.
- [5] Rothstein, Bo, and Dietlind Stolle. Social capital, impartiality and the welfare state: An institutional approach. *Generating social capital: Civi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2003: 191-210.
- [6] Uslaner, Eric M., and Mitchell Brown. Inequality, trust, and civic engagement[J].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2005(6): 868-894.
- [7] Rothstein, Bo, and Dietlind Stolle. The state and social capital: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generalized trust[J]. *Comparative Politics*, 2008: 441-459.
- [8] 韦伯. 儒教和道教[M]. 王蓉芬,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 [9] 杨中芳,彭浩清. 中国人人际信任的概念化:一个人际关系的观点[M]. *社会学研究*,1999(4):1-21.
- [10] Coleman, James 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 S95-S120.
- [11] 王绍光,刘欣. 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J]. *社会学研究*,2002(3):23-39.
- [12] Gheorghiu, Mirona A., Vivian L. Vignoles, and Peter B. Smith. Beyo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testing Yamagishi's emancipation theory of trust across 31 nations[J].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2009(4): 365-383.
- [13] Whiteley, Paul F. The origins of social capital [J]. *Social capital and European democracy*, 1999: 25-44.
- [14] 姚俊. 流动就业类型与农民工工资收入——来自长三角制造业的经验数据[J]. *中国农村经济*,2010(11):53-62.
- [15] 马瑞,邱焕广. 农村进城就业人员的职业流动与收入变化[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6):36-46.
- [16] 李长安. 农民工职业流动歧视及其对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J]. *人口与经济*,2010(6):27-32.
- [17] 李惠斌,杨雪冬. 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18] 李强. 社会分层十讲[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 [19] Erikson, Robert, John H. Goldthorpe, and Lucienne Portocarero. Inter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 in three Western European societies: England, France and Sweden[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9: 415-441.
- [20] Ganzeboom, Harry BG, Paul M. De Graaf, and Donald J. Treiman. A standard 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of occupational status[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1992(1): 1-56.
- [21] Ganzeboom, Harry BG, and Donald J. Treiman. Internationally comparable measures of occupational status for the 1988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1996(3): 201-239.
- [22] 吴晓刚. 中国的户籍制度与代际职业流动[J]. *社会学研究*,2007(6):38-65.
- [23] Blau, Peter M., and Otis Dudley Dunc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M]. New York:VVilcy,1967.
- [24] Hout, Michael. How might inequality affect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 review and an agenda[M]. *Documento de trabajo*, 2003.
- [25] Tolsma, Jochem, Marcel Lubbers, and Marcel Coenders. Ethnic competition and opposition to ethnic intermarriage in the Netherlands: A multi-level approach[J].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8(2): 215-230.
- [26] Knack, Stephen, and Philip Keeffe. 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1251-1288.
- [27] Schultz, Theodore W.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 1-17.
- [28] 黄健,邓燕华. 高等教育与社会信任:基于中英调查数据的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2012(11):98-111.
- [29] 汪汇,陈钊,陆铭. 户籍、社会分割与信任:来自上海的经验研究[J]. *世界经济*,2009(10):81-96.
- [30] 李春玲. 社会结构变迁中的城镇社会流动[J]. *社会学研究*,1999(5):82-88.